

《晨报》的文化空间*

李彦东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现代报业史上,《晨报》是与《申报》、《大公报》并立的著名报纸。晨报社开创的文化空间肇端自清末民众启蒙的理念,它充分展示了现代文化在媒介形式里的表现。《晨报》副刊展示了新文化运动从同人期刊到更为大众的传播时所产生的变化和转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转型时代,《晨报》所开辟的文化空间里,关乎民众的通俗教育与现代艺术实践并行不悖,而启蒙的话语也散落在报刊、戏剧等多种媒介当中。

关键词: 《晨报》; 文化空间; 启蒙; 市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 G 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10) 01-0041-05

The Culture Space of *Morning Paper*

LI Yan-dong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newspapers, *Morning Paper* is among the most prestigious newspapers such as *Shanghai Journal*, *Ta Kung Pao*. With a cultural space originated in late Qing popular enlightenment, it illustrat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culture in media. *Morning Paper* Supplement displayed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had gone through from being confined to literary circle to popular transmission. At such a time of big change, in the cultural space opened up by *Morning Paper*, popular education and art practice developed together and the message of enlightenment were found in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plays.

Key words: *Morning Paper*; cultural space; enlightenment; civil culture

在现代中国报业中,若以稳定持久和受众广泛而论,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足当此选。若论能从办报过程中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营利和新闻,开辟独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则除上述二报外,北京《晨报》也当在列。

这份创刊于1916年8月(初名《晨钟报》),停刊于1928年的北京报纸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躬逢民主政治探索遭遇北洋军阀之际,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之时,内中不少人士又与该报渊源甚深,过从甚密。故从消息乃至新闻的角度看,该报其时所录所写都具最优史料之价值,而事关各问题的所评所论,也多是切中肯綮的知味之言。

创刊人蒲伯英,就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蒲殿俊。民国以后,蒲氏除了继续在政治事务上发挥其影响力外,便是创办了《晨钟报》。这份有着浓重论政色彩的报纸从一开始便卷入当代最激烈的各种政治与公共事务论辩当中,甚至导致了其短暂停刊。复刊后的《晨报》,其编辑运作的方式或稍有变,副刊的风格或有不同,但将评论时政作为报纸第一义的宗旨未尝有变。如果从论政的风格看,民国时期《申报》论政习惯采用一种故事荟萃外加皮里阳秋的讽喻方式,《大公报》喜欢援引中外学理,旁敲侧击且居高临下地批评,《晨报》论政则更像身处政治漩涡者在“水深火

收稿日期: 2009-11-17 修回日期: 2009-12-08

* 基金项目: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21103991310)。

作者简介: 李彦东(1977-),男,云南陆良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学和文学方面的研究。

热”中发出的嘶喊。有关《晨报》在政治舆论上的精彩表述不是本文侧重，但不能忽略的是，论政风格的绝大差异也潜在影响着该报的文化空间的构成和演变。

真正使《晨报》在民国大放异彩的是其文化空间的独特性，有关这一点，著名报人管翼贤在《北京报纸小史》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文化界之白话文及白话文艺，为蒲氏等所提倡，一时大学生争先投稿，故该报在学界操持莫大威权。日出两大张，销路极广。北京各报历史之悠久，亦以该报为最，至今社会人士犹未忘其馨誉也。”^[1]

一、《晨报》副刊与新文化的传输

谈论《晨报》与民国初年文化的关系，最方便的角度当然是其副刊。《晨报》副刊最早是在第七版上，专门刊登学术类文字、演讲录和文艺作品。从1919年2月起，专设自由论坛，刊载了有关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学说的介绍。从1921年10月12号改为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

可能是受到孙伏园一篇文章的影响^[2]，不少现代文学论者都先入为主地以“四大副刊”来说明新文化运动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展开，但这一前提其实要稍加分割。孙伏园在该文中谈论的不过是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他提到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确实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而他提到的《京报副刊》当时才刚刚创办，还处于“广告宣传”的阶段，将其与前三者相提并论本身并不太合适，尽管在此后的表现也足有可表之处。此外，孙伏园所归纳的“理想的日报附张”是一种偏“读物”的杂志，“日报的附张到底替代不了讲义与教科书。厨川白村说得好，报章杂志只供给人以趣味，研究学问须用书籍，从报章杂志上研究学问是徒劳的。而在中国，杂志又是如此之少，专门杂志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的工作。”^[2]这应该算是一个成功副刊编辑的经验之谈，但对于“理想的副刊”这一问题，并非只有这一种观点。《晨报》副刊除了孙伏园时期的出色编辑外，李大钊和徐志摩的思路其实有更多内在的相通性，都是喜欢将报章作为宣传主义，启蒙民众的阵地，甚至成为自己的喇叭。^[3]

在《晨报》副刊出现之前，《申报》等著名

老报的副刊早已存在，而且单就文学性上讲，表现也堪称出色，“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4]但在《晨报》问世的时候，恰逢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展开，而其主编李大钊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将《晨报》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也属情理中事。但在利用《晨报》这一阵地时，李大钊并没有完全忽略该报与《新青年》的不同。《新青年》作为一个同人色彩很浓的思想启蒙类刊物，尤其是一校一刊之后，有了大致明确的文化运动目标，通过不同撰稿人的专长对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细致的批判和解剖，以期重建一种被称为新的文化。而《晨报》虽然有警醒世人的“晨钟目标”，但其实际运营中不能不考虑其传播特性以及一定的地域性。于是，在早期的《晨报》副刊中，除了有对《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相关刊物中思想学说的转引发挥外，也同样可以看到都门纪胜和剧谈等栏目。这些栏目很好地考虑到地域特点，将北京的名胜以一种历史普及的方式娓娓道来，而剧谈则很内行地评介着当时的戏曲表演，有效地勾连了社会娱乐与读者的心理共鸣。即便是以介绍思想学说为主的“自由论坛”，其介绍方式也多种多样，有演说的纪录，有读后感，有批评质疑的声音。从发挥《新青年》诸人的思考辐射范围来说，《晨报》副刊有效地将学生界以外的人士也带入讨论和批评的空间里。

《新青年》的拟想读者当然是有相当文化准备的知识阶级，对于撰稿人来说，很多主义的介绍本身固然重要，但其背后潜藏的问题更为重要。而对于《晨报》的读者来说，很多新学说本身的内容还有待说明和介绍。就拿马克思主义来说，《新青年》上的马克思专号固然有很多的译介文章，但植根其后的还是李大钊等人对劳工问题、阶级问题的持久关注。而到了《晨报》副刊上，却可以看到渊泉译注的《马氏资本论释义》的长篇连载。孙伏园所说的“讲义和教科书”，其实在李大钊编辑时期确然被连载，而且以一种知识普及的方式进入到《晨报》的读者群体当中。

当副刊从《晨报》独立出来，变成《晨报副镌》后，其发行模式的变化其实已经影响到其表述风格。《晨报副镌》能够独立于《晨报》之外单独发行，主要原因固然是当时读者对新知识介绍的不满足，“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

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还有要求增加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5]但同时也是副刊编辑有意将其当作“读物”来经营，兼顾“学理”与“趣味”。这一行动的直接结果便是主义的问题化，问题的零散化。在李大钊编辑的时期，各种主义是以完整的方式，可能不无枯燥地出现在副刊上，而孙伏园则更多采取读者趣味来决定主义的取舍，或者问题的提出。这其实对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家来说并不有利，就拿鲁迅和冰心来说，都是这一时期与《晨报副刊》关系密切的作家。冰心的问题小说名噪一时之后，更多新的问题等待她去描述，用基督式的爱去渲染，《寄小读者》系列固然文笔清雅，但很多与儿童的对话已经完全写成了布道。而鲁迅的新诗《我的失恋》被抽掉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导致了孙伏园的辞职。这事件本身的发生其实跟鲁迅诗本身的价值高下无关，凸显的是副刊编辑在拓展各类话题上的自由度。其实这一事件在1923年曾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著名性学博士张竞生在4月29日的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就有署名钟孟公的人强烈要求停止类似讨论，而鲁迅给孙伏园的信中特别强调的是，“我交际太少，能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这些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6]孙伏园后来对此事的记述更多侧重于编辑自主权的宝贵以及鲁迅诗歌的价值，但应该补充的是，正是这些话题的讨论促使鲁迅有了这样的作品，而其打油调侃的天然属性应该是《晨报副刊》的趣味使然。

在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过程中，《晨报》副刊无疑扮演着传输者的角色。同样是传输，由于不同编者的思路，所处新文化发展普及的不同情况又各有差异。李大钊将思想学说的介绍普及化，而孙伏园则将各种学说重组为各种问题，用讨论或者争论的方式将问题本身像更宽广的方向延伸，并充分利用新文学在虚构上的便利，将问题抽象化或故事化，进一步引发争鸣。在徐志摩主编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一定实绩，白话文学也有了充分的发展，这也为他在《诗刊》中同闻一多等人进行大量新诗实验提供了可能。而这一

时期的大量努力后来成为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选》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成为了一种象征资本的胜利，它慢慢渗透到此后的新诗阅读和教育体制中。如上所论，《晨报》副刊在经历着自身变化的同时，也经历着新文化传播本身的诸多问题。从结构层次上看，先是传输各种新思想，接着是传输面对思想的各种话题文学，最后是内化于文学的各种文化象征。

二、《晨报》的启蒙模式

《晨报》从创办之始，就有着浓厚的启蒙色彩，这从李大钊热情洋溢的发刊词中大可看出。而到该报发行四年之际，渊泉更是明确地说，“我们晨报有一贯底主张，有奋斗底目标。每日社论和记载里面，都可以看得出的。我们对于中国的前途，主张非根本底改革不可。全部改造底预备行为，就是先使群众能读，能写，能听。我们晨报注意这一方面底教育，也就是为此”。^[7]

应该说，在《晨报》诞生的年代，鼓吹启蒙本是众多报刊用以宣传自己的一个流行口号。但值得注意的是，《晨报》显然将对读者的教育看成一个重要的环节。对于民众读写能力的培养本是晚清以降众多启蒙者必须面对的难题，也是白话文运动风生水起的一个现实原因。

有关白话文运动，最为人熟知的“史实”莫过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和推广，但更多样的尝试至少可以上溯十多年。除了王照对拼音文字的提倡外，当时各地都出现了白话报刊。内中较为著名的有彭翼仲的《京话日报》、孙翼中的《杭州白话报》以及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等，这些其实已是白话文运动的实践了。^[8]

对于白话报刊的创办者来说，他们的初衷自然是将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最大限度地传递给最大范围的人。但文化人口绝对数量的稀少使得这种构想变换成其他方式进行，就拿北京的《京话日报》来说，它的发行并非为盈利，而主要是对下层民众的启蒙。除了一些“志士”义务“派送”外，后来出现了专门的阅报处，为了解决很多人连白话都读不懂的窘境，又专门出现以演说报纸来启迪民众的情形。正如后来成为民国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在《漱帚自珍》的序言里所说：

因为我中国教化不讲，识字者十人中只好得一人，此书纵然浅显，也要识得字，才念得过。

若只一人能看，那九人岂不向隅。我曾听人说，外国有一种演说会，每日夜晚或礼拜日，趁各处放工，众人闲空时候，拣那好报纸，与一切新闻，向众演说。所以外国虽是下等之人，于国家事情，普通道理，没有不晓得的，故尔人人有爱国之心。

尽管“讲演能转移风气，而听者未必皆有兴会”^[9]，当时的启蒙“志士”们还想法设法利用戏剧的力量，用时事剧来影响和塑造观众。在晚清启蒙者“无所不用其极”的启蒙设计里，不单单能看出启蒙的“艰辛”，也能够看出报刊、演说和戏剧等不同表达样式都凝练在通俗教育这个整体之下。

民国教育部人士其实对清末的通俗教育理路比较清楚，所以在1915年成立的通俗教育会几乎就是对清末白话文运动成绩的一个组织性归纳。该会隶属于教育部，会长由教育部次长兼任，在众干事之外，附设小说股、讲演股和戏曲股。在第一次公布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名单中，可以看到会长是由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担任，桐城派后学高步瀛成为经理干事，而周树人则是小说股主任，创办《京话日报》的彭翼仲也成为了讲演股名誉会员。^[10]到了1918年，各省通俗教育会的数量蓬勃增长，四川、云南的教育会处数都达到24个，居全国之冠，而参与通俗教育会的会员数最高的是河南，达1956人。^[11]教育部的这些机构和制度无疑对当时的白话文学推广和普及有着潜在的帮助作用，所以当胡适、陈独秀还在使用文言来表述文学革命的迫切性时，对拟想中的精英进行启蒙之时，这些通俗教育机构已经为其进一步壮大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如果从当时盛行的三种启蒙形态（即报刊、演说和戏曲）来看，报刊更便于在小说一项上大做文章，因为小说在阅读上能够更能够跨越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约束。而在讲演和戏剧上，没有现场感的文字介绍却很难“搔到痒处”，《新青年》固然出过“易卜生专号”，也引起过思想界的轰动效应。不过如放在民众教育上，则不仅会产生“娜拉出走之后”的困惑，在实际的编剧演出中效果必然不佳，“易卜生底剧本，不但拿梅兰芳、杨小楼等做工，口白演出来不成东西，就是让现在卖钱的新剧大家去演，易卜生看见也只是得叫那连珠箭的苦”。^[12]正是在这种落差当中，爱美的戏剧才在北京开始流行起来，“爱美的戏

剧在北京城里出现的时候，是民国九年九月十月间。那时候北方几省正闹着旱荒，非常危急。所以当时演剧底近因是为要筹赈灾的款子，其远因却因为《新青年》杂志及各处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报纸上常常有讨论戏剧的文字——止水先生独立经营的《实话》报上差不多没一天没有一篇关于戏剧研究的文章。一般青年都已到了跃跃欲试的境地。从此以后，种种名目的游艺会愈开愈多，而且每一次的游艺会总有数幕新剧。爱美的戏剧底最盛时代，自然要算今年春间了（1922），男女高师，清华，北大，中大等学校相继开演”。^[13]尽管蒲伯英并不认同“爱美的戏剧”这一提法，他更愿意将戏剧演出作为一种职业来提倡，但在借用戏剧来启蒙这一点上，他与倡导爱美剧的陈大悲并无不同。

蒲伯英等人当然激赏易卜生在戏剧文学上的成就，但对于其表演性却有着肯定的悲观。也正是在陈大悲的鼓动下，蒲伯英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用科班训练来矫正爱美剧带来的随意性是人艺剧专出现的原因，尽管其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它却展示了在新文化运动迅速展开之后，启蒙在结构上的变化。清末的民众启蒙几乎是靠众多“志士”不计回报的付出，而在民国之后，社会启蒙已同通俗教育结合在一起。1920年代人艺剧专的出现，在最基本层面是发展了一种演艺的职业教育，但进而却是将启蒙中的讲演和戏剧的样态通过教育的方式薪火相传下去。人艺剧专是以培养话剧人才为核心，从它的招考布告上大略可看出它的挑选标准以及培养导向：

试验朗读剧本时，任投考者自选下列三种之一，当众读一两页。能以声调传布词句中之情绪者为合格。

黑暗之势力 商务印书馆出版

银盒 戏剧杂志一卷一、三、五号

扇误或遗扇记 《新潮》一卷三号或《新青年》六卷一、三号^[14]

从布告中可以看出，能够继续深造的学员最须具备的才能便是讲演才能，他要能将自己理解的氛围通过情绪感染的方式传达给听众，而考试范围则是与新文化期刊出版密切相关的文本，这就迫使未来的考生都必须置身在新思想新剧本的范围当中。而人艺剧专校董的构成既有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元老，也有周氏兄弟等白话文学

作家,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文化态度有不小差异,但显然在借用戏剧启蒙这一点上又有着相契之处。

从启蒙处境上看,五四之后的北京文化界自然要比清末有利得多。民国政府的建立虽然没有彻底将皇权的阴霾驱除,但各种文化观念的宣传普及所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小,现代文化在各种传播媒介中广为散布。报刊固然发挥了其宣传上的最大能量,而讲演和戏剧也变换其形式,通过现代艺术的演变进入到启蒙的前沿阵地中。而《晨报》的存在正好将这些单独分散的启蒙形式整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晨报社开创的文化空间肇端自清末民众启蒙的理念,它充分展示了现代文化在媒介形式里的表现。《晨报》副刊展示了新文化运动从同人期刊到更为大众的传播时所产生的变化和转折,而围绕《晨报》周围的各种启蒙活动将清末民众启蒙的实践朝一个整合的空间里发展。在此空间里,关乎民众的通俗教育与现代艺术实践并行不悖,而启蒙的话语也散落在报刊、戏剧等多种媒介当中。

[参考文献]

- [1] 杨光辉.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409.
- [2] 孙伏园. 理想中的日报附张 [M] //张静庐辑.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现代甲编. 上海: 上海书店, 2003: 218-222.
- [3] 徐志摩. 再剖 [N]. 晨报副镌, 1925-4-7.
- [4] 鲁迅. 上海文艺之一瞥 [M] //鲁迅全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98.
- [5] 晨报副镌出刊启事 [N]. 晨报, 1921-10-10.
- [6] 鲁迅. 致孙伏园 [M] //鲁迅全集: 1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34.
- [7] 渊泉. 本报四周年纪念日 [N]. 晨报, 1922-12-1.
- [8] 李孝梯.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1-1911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9] 蔡鹤卿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上演说词 [M]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教育.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557.
- [10]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录 [M]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教育.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549-554.
- [11] 教育部公布全国各省通俗教育会概况 [M]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三辑教育.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566-567.
- [12] 陈大悲. 爱美的戏剧 [N]. 晨报, 1921-4-27.
- [13] 陈大悲. 爱美的戏剧之在北京 [N]. 晨报副镌, 1922-6-22.
- [14] 人艺戏剧学校话剧系布告 [N]. 晨报, 1922-11-13.